

城市史研究

URBAN HISTORY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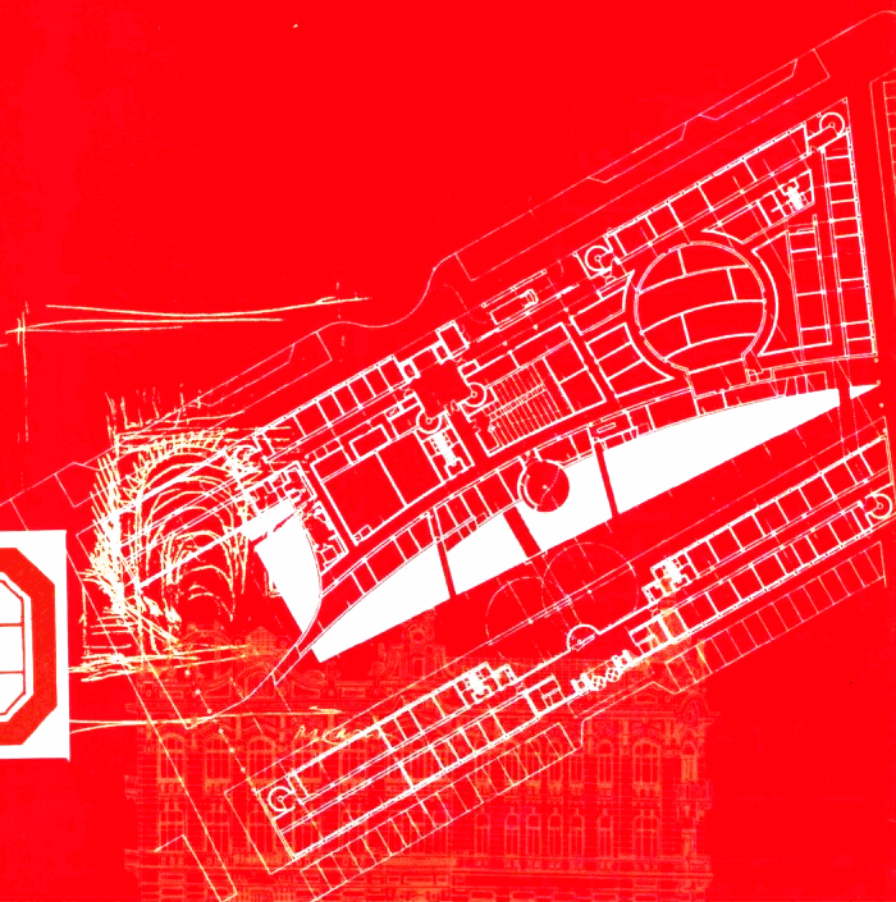
第17-18辑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编 委 会

顾 问 李锦坤 刘玉麟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新平 王明浩 冯承柏

刘洪奎 沈玉麟 林纯业

罗澍伟 胡光明

编 辑 部

主 编 刘海岩 刘洪奎

副主编 周俊旗

编 辑 任云兰

目 录

城市社会

从人口分布看近代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特征

..... 王 均 孙冬虎 岳升阳 吴文涛(1)

乱世:天津混混儿与近代中国的城市特性

..... 关文斌著 刘海岩译(18)

近代青岛人社会人格形成及其特征(1897—1922) ... 任银睦(38)

城市经济

中国近代民用工业在城市的分布状况(1840—1927)

..... 谢 放(56)

清末“新政”时期长沙发展经济热潮的几个特征 李 玉(70)

清末民初天津金融市场的帮派 林地煥(78)

略论近代城市发展的条件与动力

——对杭州城市近代化的剖析 陈自芳(98)

城市文化

上海、天津近代城市文化比较浅析 郭武群(115)

简论天津城市的文化特质 莫振良(126)

试论天津文化的优长与弱势 周俊祺(137)

研究综述

城市、城市理论与城市史	罗澍伟(145)
近年来区域城市史研究述评	赵 可(165)
20世纪中外近代京津冀城乡史调查与研究概述	徐永志(188)

国外城市史研究通讯

国外研究动态

北京史研究在海外	史明正(196)
上海与近代中国的多元性	顾德曼著 袁 燕译(214)
汉城城市史研究的趋势	高东煥著 袁 燕译(224)

会议述评

中国沿海地区:文化、商业与社会	杜文凯著 贾锡萍译(236)
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行动	
..... 杰弗里·W. 科迪著 刘红娟译(240)	
附录:保护和开发历史名城国际合作苏州宣言	(247)

书评

民国上海的生动写真	杰弗里·科迪著 王尧译(250)
日本学者眼中的近代天津	
——第一部由日本人编写的《天津史》问世	
..... 贵志俊彦 张利民(254)	

书目与博士论文摘要

货币与近代银行研究书目选	史瀚波著 任云兰译(257)
近期中国城市史研究博士论文摘要	贾锡萍译(270)

URBAN HISTORY RESEARCH

Number 17—18,1999

CONTENTS

Urban Society

The Space Features of Urban Socie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Modern Beijing

Wangjun, Sun Donghu, Yue Shengyang & Wu Wentao(1)

Order in Chaos: Tianjin's Hunhunn and Urban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Kwan Man Bun(18)

The Formation and Traits of Social Personality of Modern Qingdao People:1897—1922

Ren Yinmu(38)

Urban Economy

The Distribution of Civil Industries in Modern Chinese Cities: 1840—1927

Xie Fang(56)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s of Changsha in the 'New deal' Period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Li Yu (70)

On the Gangs of Tianjin Financial Market in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China

Yim,Chi Hwan(78)

On the Factors and Dynamics of Urban Growth in Modern

China: An Analysis of Hangzhou Urban Modernization

..... Chen Zifang(98)

Urban Culture

Perspective Analysis of Urban Culture in Modern Shanghai and
Tianjin Guo Wuqun(115)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Traits of Urban Culture in Tianjin
..... Mo Zhenliang(126)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Cultural Superiority and Weakness in
Tianjin Zhou Junqi(137)

Summaries of Research

City, the Theories of City and Urban History
..... Luo Shuwei(145)

Commentaries of Regional Urban History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Zhao Ke(165)

Summary of 20th Century's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His-
tory of Towns and Villages in Modern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by the Chinese and Foreigners Xu Yongzhi(188)

Newsletter of Overseas Urban History Research

Trends of Overseas Research

Overseas Beijing History Research Shi Mingzheng(196)

Shanghai and the Hybrid of Chinese Modernity'
Bryna Goodman, Translated by Ren Yunlan & Yuan Yan (214)

Trends in the Study of the Urban History of Seoul

..... Ko Dong—Hwan, Translated by Yuan Yan(224)

Summaries of the Symposium

Maritime China: Culture, Commerce and Society

..... Wing—kai To, Translated by Jia Xiping(236)

Taking Steps Toward Protect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 Jeffrey Cody, Translated by Liu Hongjuan(240)

Book Reviews

Republican Shanghai Vividly Portrayed

..... Jeffrey Cody, Translated by Wangyao(250)

Modern Tianjin in the Eyes of Japanese Scholars; the Publication

of Tianjin History Firstly Written by Japanese

..... Toshihiko Kishi & Zhang Limin(254)

Bibliography and Abstracts of Dissertations

Money and Modern Banks: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 Brett Sheehan, Translated by Ren Yunlan(257)

Abstracts of Recent Dissertations in the Field

..... Translated by Jia Xiping(270)

从人口分布看近代 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特征

王 均 孙冬虎 岳升阳 吴文涛

一、引 言

城市是一种地域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城市的功能需要人类的社会活动去实现,因而城市功能空间与社会空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由城市人口分布或居住分布得以体现。城市内部社会异质性和社会空间分化是城市研究的基本内容。这项研究一般以古典城市生态学作为基本范式,以城市社会学及城市地理学的社区分析、因子生态分析为基本方法,通过社会调查和区位分析来认识所研究的的城市或社区现象。历史城市地理学、城市史学都有必要借鉴这种方法,从人口规模、人口分布、职业构成与分布、社会空间结构与形成机制等方面对近代中国城市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以取得对典型城市发展史的相对连续的认识。近代城市空间的经典模式是针对本世纪初的美国城市提出的。如果把眼光扩展到这些空间模式的起始时代及更早的时代,我们会注意到还有前工业城市模式。^①在人类社会的步行时代,受到交通条件与食物供应的限制,城市建成区空间范围和城区非农业人口规模都是有限的。在前工业城市内部,社会空间

^① 肖伯格 (Sjoberg G.):《前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过去与现在》(*The Preindustrial City, past and present*),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60年。

分化又受到社会制度、民族传统与宗教等级的制约,社会阶层分化直接体现(投影)到社会空间格局,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等级人群呈现对比性的居住区位导向。从世界范围来看,封建时代的城市(例如帝都北京),核心一般都是宫殿、行政场所或宗教场所。统治者和社会上层集聚于中心地带,或者环境与区位最优地段。例如在清代帝都,皇帝占据着紫禁城,贵族与八旗占据着内城,拱卫禁城,“北京内城无异于一座戒备森严的军事大本营”^①。地位低下的汉族官员和广大平民被迫迁居到外城前三门外。层层的城市是封建社会阶层隔离和民族隔离的真实的物质象征。

如果把眼光扩展到广大非西方城市,近代城市社会与空间的实际情况与近代欧美城市的经典模式相比也有所变异。以60年代的拉美城市为例,这些城市的近代化起步于殖民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自然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城市。虽然在这些城市内部普遍产生了商业化功能区,出现了近代市政设施,然而在市内、市际交通工具尚未发达、社会分化相对稳定等因子作用下,若干典型拉美城市仍符合西方学者所描述的前工业城市模式,即社会中上水平收入的家庭倾向于在城市中心地带居住,空间流动能力低下的社会下层不得不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如城墙内侧、铁道外侧),也就是现在意义上的城乡结合部和外来人口集聚地^②。前工业城市和近代拉美城市这两类研究范例,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通过广泛的城市比较研究,有可能产生对城市演化的规律性认识。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根据清末民初以来北京(北平)相对丰富的市政与人口统计档案及其他资料,参考当时社会学者实地调查

① 刘小萌:《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② 格里芬(Griffin E.),福特(Ford L.):《南美洲城市结构的模式》(*A Model of Latin American City Structure*),《地理评论》(*Geographical Review*),1980年,第80(4)期。

的结果,应用定量区位分析方法,力求从结构上显示当时城市社会与城市地理的实态。显然,要达到这一目的很难沿用传统历史地理学和史学的沿革描述方法,如日本学者秋山元秀所说的“人文性的历史描述”的方法,“在面对着这一大堆复杂多变的城市现象就显得不知所措了。”^①

二、近代北京城市内部的社会阶层分化

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层次位置的各个社会集团具有显著区别于其他集团的社会权力、空间行为特征和居住区位取向。在典型的商业社会中,货币是个人及家庭财富的直接载体,是其社会地位及生活行为的基本体现,所以近代社会阶层分析的最常用方法就是家庭货币的收入—支出分析。在20年代,曾留学美国的社会学者李景汉就使用这种方法通过抽样对北京市民生活程度做了调查研究,根据西方社会统计原理将北京(北平)的市民大略划分为极贫穷的、维持的、安乐的和奢侈的四个基本阶层和若干亚层(表1)。这种分化指标依据的主要是典型家庭收支调查,与清代的民族分化全然不同。

三、清末民初京都(北平)的城市社会空间

城市空间(urban space)具有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两方面含义。城市地表及市政建筑原本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结构,由于不同社会集团占据了城市地表不同区位或地段,将社会阶层差异附加于、投影于实地物质空间,进而形成马塞克式的人口分布差异及社会空间差异。在美国经典城市研究中,大都验证了城市人群的社会地位、家庭、种

^① 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书评》,《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4期。

族(民族)是近代商业社会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三个基本变量,导致城市内部社会空间特征分别呈现扇面状、同心圆状和斑块状分布。

表1 20年代北京(北平)市民阶层及其生活程度

社会阶层	职业类型	数量	户均年收入 (元)	住房状况
仅维持生存的	乞丐	5万户	...	1间大杂院房
自立的、对付的	车夫、非技术工人、伙计	6万户	170	1间房
知足的	技术工人、邮差、店铺雇员	6万户	200—300	1间房
看着舒服的	技术人员、教员、下层官员	3万户	300以上	2间房
安乐的	大学教员、职员	...	...	院落
奢侈的	资本家、官僚、贵族	...	...	宅门大院

资料来源:李景汉:《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社会学界》1929.3(1)

1. 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的作用

如果以市民经济状况作为认识城市社会特征与空间特征的基本指标,就可以引用民国时期北京社会调查的结果,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划分出相应人群的集聚区。海外学者章英华曾认为“由于官吏、工商业者、无技术劳工等的低隔离状态,使得北京虽有内外城的行政和商业的对比,并未显示明显的阶层隔离现象。”^①基于相同的史料,笔者

① 章英华:《二十世纪初北京的内部结构:社会区位的分析》,《新史学创刊号》,1990年,第77页。

认为近代北京城中的社会阶层与人群混杂居住与相互分离的作用力都是客观存在的,导致特征演化的方向却是从满汉畛域的鲜明分化转向由社会地位引导的分化,在转化过程中出现混杂现象也是城市演化的必然。

(1) 贫民区的分布

自清末新政以后,北京城内广泛的失业、贫穷等现象成为逐步显现的社会问题。近代北京贫穷现象凸显的原因主要有旗民众多、1928年国都南迁以及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等等,而在北平市时期更为突出。城市贫穷现象又体现在贫民空间分布的边缘化特征,正如牛鼎鄂所描述的:“贫民所需要之房屋,只求有栖身之处,能避风雨于愿足矣。再则无论任何简陋僻巷,但求其价廉,即乐于迁就,不计其位置是否冲要。此即东北城及东郊关厢贫民独多之原因之一。”^①又如陶孟和所描述的:“北平本无贫民窟,尚不见现代城市贫富区域对峙之显著现象。但近年(20年代)以来,贫民在经济压迫之下,已逐渐移居于城厢及城内街道偏僻房屋破旧之区域。”^②北平市时期(包括沦陷时期)的多次贫民调查都表明城市中心区贫民比例明显很低而边缘区明显很高,只有原皇城所在的内六区处于平均状态(表2)。

(2) 社会中等阶层居住区

从陶孟和等著名学者的社会调查反映出,在20—30年代,北平等家庭户均年收入在200—3000元,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事公务员、教员等职业,平均月房租支出在6元及以上。“诸费用俱从节俭。若不遇婚丧之事,除去普通一切用费,每月尚有余金46元。子女可入学读书。”^③如历史地理学前辈谭其骧先生,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北平图书馆就职,月薪60元,在大学讲课每小时5元,稿费每千字5元。在物价

① 牛鼎鄂:《北平一千二百户贫户之研究》,《社会学界》,1933年第7期。

② 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第22页。

③ 曾萃英:《北京中等家庭之生活》,燕京大学毕业论文,1925年。

低廉、服务过剩的北平，社会中层人士的生活是相当充裕的^①。

表2 民国时期北平城区贫民户统计

单位：(占当地总户数)%

区别	1929年	1931年	社会区特征	区别	1929年	1931年	社会区特征
内1区	5.20	3.7	中等	外1区	0.50	0.3	中等
内2区	8.70	6.3	中等	外2区	1.05	4.7	中等
内3区	22.69	19.1	下等	外3区	20.94	16.0	下等
内4区	26.34	22.7	下等	外4区	23.84	20.2	下等
内5区	22.58	18.4	下等	外5区	0.78	0.5	中/下等
内6区	17.60	13.9	下等	平均值	15.03	12.1	—

资料来源：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1931.2(3)

牛鼎邦：《北平一千二百户贫户之研究》，《社会学界》1934.7

注释：1900—1949年间，北京(北平)城区郊区的警区、政区沿革复杂多变，具体位置请参考《北京历史地图集》。

对应社会中的职业特征，根据可信的民国时期城市人口分区统计，可以认为当时北京城中教员、职员、商人比重较高的区域，即中心地带具有中等阶层居住区的特征^②。另外，在1933年北平市举办区坊自治选举时，“市民多不及知，故以本市150余万之市民，实行登记者不过10万有奇。”^③表3以当时社会发展水平和市民参与城市活动的的能力而论，能够主动参与城市社区事务的北平公民可以归于中等阶层。由于城市中心各区，特别是内城南两区市民参选比重相对较

①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1995年。

② 王均：《1900—1937年北京城市人口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1996年第15期。

③ 北平市政府秘书处：《北平市政府二十二年下半年行政纪要》，京城印书局，1934年，第127页。

高,加以区坊自治经费较多,可以划为中等阶层居住区。

表3 1933年北平城区自治选举统计

区别	区坊收 入(元)	公民比 例(%)	分区 特征	区别	区坊收 入(元)	公民比 例(%)	分区 特征
内1区	3258	5.55	中等	外1区	1730	5.62	中等
内2区	2742	10.16	中等	外2区	2437	5.62	中等
内3区	1185	3.01	下等	外3区	1008	2.01	下等
内4区	1179	2.08	下等	外4区	911	6.28	中/下等
内5区	698	2.79	下等	外5区	1107	5.74	中/下等
内6区	648	3.15	下等	总计	16903	4.90	——

资料来源:北平市政府秘书处:《北平市政府二十二年度行政统计》1934,145—148。

当时处于外城边缘的北平市外四区和外五区包含着天桥、龙须沟、先农坛根等贫民区和原宣南坊、香厂新市区等中层阶层居住区。广大流动人口与户籍统计的在籍人口、无业游民与在业人口混杂分布,不同角度的统计体现出不同的结果。但城市边缘地段近代市政普遍落后、居住环境日益恶劣的状况是客观存在并不断发展的。

(3) 上等阶层居住区

在近代城市内部,上等阶层居住区综合体现着区位地理条件、市政设施、消费服务、社区环境等多方面的最佳组合,往往占据着城市内部最方便、最舒适的地段。在市场竞争的社会,大型商业服务业必然追随着富人居住区而迁移。两者相近分布似乎是西方近代城市的普遍现象^①。这种现象在近代北京城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① 多莫西(Domosh M.):《造就商业城市:19世纪纽约和波士顿的零售商业区》(Shaping the Commercial City: Retail Districts in 19th Century New York and Boston),《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0年,第80(2)期,第268—284页。

自元代以来长期作为国都的北京城,曾经容纳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最高阶层,也就是满清贵族、民国政客、军阀、高级知识分子等等。其居住地取向与消费行为对当时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确定上等阶层居住区的直接资料就是相关人物的住址,例如20年代临时执政府部门主管官员的住址登记(表4)、历年电话簿中的私人用户记录及地址簿等。城市中优良的住宅、先进的市政设施及高档消费服务的发展一般都是富人居住区的伴生物。例如电话进入北京以后,除公务电话外,最初的私人用户自然是权贵、官僚与士绅。将近代社会上层人物的住址记录、电话用户记录落实到同时期的城市地图上就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些人物的居住地呈斑块状散布在东城的东单以北、北城的南锣鼓巷、西城的西四、宣武门外原宣南坊、前门外的长巷等地^①。这些地区居住环境相对良好,临近王府井、西单等新兴繁华商业区,与城市边缘的贫民区相互隔离。从目前北京旧城中保存相对完好的四合院和优良近代建筑来看,社会上层居住区具有显著的历史与地理位置的延续性。尽管这些居住区的主人不断地变更,破落者变卖家产,迁出豪宅大院,新富者买房置地,仍然延续着社会上层对该地段的占据。即使在国都南迁、大量权贵随之迁移,以及破落满族贵族纷纷投奔伪满洲国以后,在北平城内做“寓公”者仍大有人在。

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形成的有机整体,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城市内部社会各阶层、各种职业成分的分离分布与混杂分布并不能理解为固化的、静态的格局,两方面相向的运动过程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历经庚子之变、民国建立、五四运动、军阀更迭、国都迁徙、八年沦陷与短暂的光复,几度风云变幻的近代北京城内,无数历史人物如走马灯般你来我往,塑造了不同的社会居住区特征。因此近代北京城内部社会空间的首要特征是动态变化,其次是在政局还算相对稳定的

^① 《宣统三年北京电话史料》,《历史档案》,1994年第2期—1995年第2期。

清末民初时期(1900—1937年间),出现了类似西方近代城市的、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与居住空间地段相关对应的特征。

表4 民国临时执政府部分主管官员住址统计

部 门	住 址	部 门	住 址
秘书厅秘书长	东单三条	稽核所	山老胡同
军务厅	铁狮子胡同	交际所	前细瓦厂
侍从武官处	北门仓	翊卫处	三座桥
指挥处	文昌胡同	医务处	北草厂
礼官处	东单二条	文承宣司	南弓匠营
收支处	孟公府	武承宣司	本府
庶务司	孟公府		

资料来源:《临时执政府职员录》192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在宏观社会背景动态变化的层次之下,在城区交通尚未发达、就业地与居住地不可能长距离分离的前提下,具体城市地段上各阶层混杂居住的确是近代城市空间特征的不争事实,但种种现象并未掩盖该地段的主导阶层的作用。例如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北平)城内内一区 and 内二区(内城南)职业结构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事服务”者较多,表面上对应着的地段特征应当是混杂居住。实际上,大量社会下层对上层的依附正表明社会上层(包括外国使馆、工商业人口)的居住消费是该地段社区特征形成的主导因素。清末新政以后,新兴商业服务业在东单、王府井、西单等地段发展起来,就是临近地段社会中上阶层集聚居住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西交民巷银行街出现的结果之一,是近代商业社会城市空间演化过程的合乎规律的结果^①。

① 高松凡:《历史上北京城市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地理学报》,1989年,第44(2)期。

2. 家庭因素的作用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与此对应,家庭住宅就是城市社会空间的基本单元。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北平)人口统计中,“户”的概念是在相对稳定的建筑(如四合院)内共同居住的经济家庭而不是以婚姻维系的血缘家庭,因此必然包括了外地来京的寄宿人口,包含就学人口和学徒、就业人口。近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纳妾现象也必然增加富裕家庭的人口数,降低区域性比例。以1917年的城市统计为例,近代北京城区中心地带(内城南部和外城北部)的户量大都在5.0人/户以上,城区边缘(内城北部和外城边缘、城墙根儿地带)及旧皇城的户量都在4.9人以下(表5)。从客观统计中反映出的现象一般不会是偶然出现的。根据一定的实地社会调查,美国社会学者甘博指出“在任意给定的人群中,(北京城内的)家庭规模都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很容易理解,户量高(家庭人数多)就直接表明其家庭经济条件、经济能力一般能够维持较多人口的生活^①。就当时的卫生条件和妇幼保健水平而论,家庭中妇女和儿童的数量与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经济条件直接相关,与其享有的、近代北京城内有限的卫生服务资源直接相关。

户密度(户/平方公里)是综合反映城市家庭居住环境和居住质量的重要指标。从1917年的城市统计及北平市时期的统计上看,除去大面积宫殿、园林、水域、空地等非居住用地的影响因素之外,北京(北平)内城的户密度普遍处于中等状态,最高密度(4309户)出现在东四传统商业地段,表明“大杂院”混杂居住现象尚未出现。大略以3000户的密度推算,户均占地面积在333平方米,生活环境应当是相当宽松的。与内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城居住用地上的户密度一般达到5000户/平方公里,在天桥、天坛以北的地段高达7260户/平方公里,推算户均占地面积在130—200平方米。除去道路、店铺营业面积

^① 甘博(Gamble S.):《北京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纽约:G. H. 多兰公司,1921年,第271页。